

容闳与梁启超

刘玉全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耕读之家。这一年8月，容闳组织的第二批30名留美幼童由上海出发到美国留学，时年容闳整整45岁。梁启超少年聪颖，被乡邻誉为神童，取字卓如，成年后号任公，意谓以天下为己任也。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八名，第二年进京会试落第，结识南海康有为，从此，拜康有为为师，追随康氏奔走天下，组党结社，办报创刊，鼓吹维新变法，一支笔横扫千军如卷席，成为左右晚清政坛的舆论骄子，时人并称康梁。在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维新事业中，容闳与梁启超这对相差45岁的忘年交，结下了深厚、真诚的友谊。

一、危机关头，容闳搭救梁启超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这时候，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撰写的维新变法文章

风靡海内外，震撼国人心，已经名满天下。光绪皇帝6月15日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并授以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6月16日，光绪帝又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当时，梁启超虽暴得大名，但仅是一位举人，并没有官场职务，康有为仅是一个六品衔的工部候补主事，由皇帝亲自召见，并委以官职，这在大清朝是破天荒头一次，引天下瞩目，朝野议论纷纷。9月5日，光绪帝下诏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此时的康梁呼朋引类，意气风发，广招天下贤才以辅佐光绪。

时在上海寓居的英国人李提摩太与容闳一同乘船，从上海赴北京参与新政，康有为推荐李提摩太为光绪帝的顾问。据《张荫桓日记》记载，容闳到京后居住在三条胡同金顶庙（1919年出版的林传甲总撰的《京师街巷记》记录“金顶关帝庙”在“东单牌楼三巷西口”，而“东单牌楼大街之西有巷曰三条。西至王府井大街。东至单牌楼大街”）。梁启超当时居住在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康有为则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三人同在南城内居住，距离很近，步行大概十几分钟。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记载说：“……予睹此状，乃决意留在北京，以觐其究竟。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正当光绪帝大刀阔斧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变法之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悄悄举起了屠刀，康梁预感到政变危机，决定向光绪帝推荐军事新秀、倾向维新的袁世凯。9月12日，康

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推荐袁世凯，9月16日，光绪帝就召见了袁世凯，并授予兵部候补侍郎。这一非寻常之举，引起慈禧太后的密切关注，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慈禧准备向光绪摊牌。光绪帝已是自身难保，9月17日，下密诏给林旭，谕以政变危机，要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速筹良策。9月18日夜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南海会馆跪读密诏，相拥痛哭。决定由谭嗣同赴法华寺夜访袁世凯，游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劫杀慈禧太后，救护光绪帝。谭嗣同走后，梁启超与康广仁跪求康有为赶快离京南下，随即梁启超来到容闳的住地，三条胡同金顶庙处等候消息。等到深夜两点多钟，康有为也来到金顶庙打探消息。容闳建议，向美国公使馆求助，但康有为认为美国公使馆没有兵力，无济于事，把宝押在袁世凯身上。

当谭嗣同凌晨回来说袁世凯首鼠两端，并无救皇上的诚意，康有为这才决意南下上海。第二天，康有为急匆匆离开北京。而梁启超则往谭嗣同寓所，“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谢国桢在《梁任公先生遗事》记载：八月初六日下午（9月21日），先生（梁）由南海会馆步至浏阳会馆，访谭，作竟夕谈，凌晨，而南海馆被围之报至，复生惊走，访大刀王五欲脱德宗于厄，先生则往日使馆，访伊藤博文。博文劝之留，不可，乃为驾驶骡车以出，并约先生夜归。

曾任李提摩太中文秘书的程滄，追述戊戌政变发生后的情形，曾说：“忽容纯甫来函，致李提摩太”，“言政府缇骑四处，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因为梁启超1895年也曾经担任过李提摩太的

秘书，当时四处都有搜捕康有为、康广仁的清兵，满城流言，太后临朝，皇帝病危，京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朝野无人敢与维新派接触，所以，容闳才求助于李提摩太。还有资料记载：当时的决定是李提摩太求见英国公使，请英国设法保护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容闳以美国公民身份求见美国公使，梁启超求见日本公使。但是英国公使当时去了北戴河，不在北京，美国公使去了西山，倒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帮助梁启超化装逃出北京，从天津逃亡到日本。9月24日，张荫桓及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相继被捕，容闳在京师难以藏身，只身逃到上海英租界避难。

二、庚子勤王起义期间容闳与梁启超之关系

容闳逃到上海，避难于英租界，与聚集在上海的维新志士唐才常、汪康年、章太炎、经元善等往来联系，并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互通信息，密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1898年10月26日，梁启超与日本外务大臣志贺重昂进行笔谈，志贺问到康先生航英国的事，梁启超答：“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闳，前任驻美国公使，乃曾国藩君所任用，后为人所谗言免官，寓美国三十余年，曾在美大学校领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约一月以后即来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促其来，来后即行。”

这时候，容闳已经与孙中山、杨衢云领导的兴中会秘密接触，联络人就是容闳的堂弟，第三批留美幼童容星桥。在容星桥的引荐

下，容闳来到香港，与兴中会骨干谢纘泰会见，商量武装反清起义，经过多次谈心、探讨中国当前局势，两人结为密友，谢纘泰又把容闳引荐给兴中会在香港的首领杨衢云。会商的结果是联络维新党人共同举行武装反清起义。而康有为在日本当局的威逼利诱下，等不及容闳，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后游历欧洲。梁启超则留在日本，继续领办《清议报》，鼓吹维新变法，揭露清廷腐败。这段时间，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它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当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回国组织勤王起义时，孙中山、梁启超均前去送行，“唐才常、林圭等人由东京返国举事时，梁启超在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出席，并介绍了各自的部下，以助唐才常起事。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勃然大怒，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与孙中山妥协联合。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这时候实质上并未放弃联合孙中山共同举行武装起义的倾向，而容闳在香港的活动，也是极力促使保皇会与兴中会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

梁启超是1899年12月31日下午登上檀香山口岸的，本来梁启超在檀香山准备只停留一个多月，然后赴美洲，联络海外华侨，筹措勤王起义资金。但由于种种原因，梁启超在檀香山整整停留了

半年多，这半年多时间，他在檀香山华侨中到处演讲，筹措捐款，支持国内勤王起义，还提出三项计划，一是组织菲律宾的散兵游勇，供内地豪杰指挥，二是准备前往美国筹借大宗款项，三是举行武装起义后协调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这三件大事，梁启超均向康有为提出借重容闳的威望实现。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写给时在新加坡的康有为的信《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说：“弟子前书有速请纯公来（纯公即容闳）之议，某西士亦有一书致纯老，想悉达。兹细思纯老来美，所补有限，某西士之事成否，不系于纯，而先生左右不可无一深通西文之人，以资赞画、备交涉之用，故纯公以勿来为宜。菲岛之事，或劳纯老一行，则甚妙。”四月初一日，再《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说：“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赠力。弟子前信因以日内大事在即，夫子左右不可无一通西语之人，故阻其行。今见此次来书，大约去事尚远，能抽暇一来最妙也。”

所谓“大约去事尚远”，是指庚子勤王起义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梁启超要容闳抽空来一趟檀香山最好。1900年的容闳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从信中称容闳为纯老、纯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容闳的尊敬与信任。信中所说的某西士，是指檀香山经商的美国人赫钦。这个赫钦据梁启超的介绍说：“此人曾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也，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梁拟下月偕往。”梁启超在4月28日致孙中山函中，也透露了自己的这一计划，认为若能“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可见梁启超

对这个赫钦往美国借款，抱有很大期望，他准备与容闳一起陪同赫钦去美国筹措借款。并且梁启超还付给赫钦两万元美金作活动经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大概梁启超希望容闳能监督赫钦。4月15日，他函告雪梨（悉尼）保皇会同志：“弟前本拟即来贵埠，顷有与美国政府互商之事，日间容会长闳已约定即来美同办，故不得不候之，以此事关系重大也。”无奈当时美国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仍以疫防为故，只许白人搭船，亚洲人皆不许”。再加上清政府驻旧金山使馆官吏的阻挠，因为这些原因，梁启超迟迟不能赴美。

信中所说的“菲岛之事，或劳纯老一行，则甚妙”，是指菲律宾抗击美国侵略失败后，有一批散兵游勇，滞留在菲律宾与新加坡的海岛之间活动，康有为准备借用这批士兵，由广东入境，配合长江流域与两广起义，梁启超建议由容闳去组织，最合适。这时候，容闳已经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在一起商量庚子勤王起义事项，同时还有维新志士丘逢甲，新加坡著名反清义士邱菽园等人。他们经常在邱菽园为康有为提供的住所恒春园南华楼上聚会，筹划起义事项，饮酒赋诗，抒发豪情。丘逢甲曾作《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即送西行》诗：“南出终张楚，西行更哭秦”，此典出自《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率吴兵灭楚以报父兄之仇，申包胥在秦廷痛哭七昼夜，终感动秦哀公发兵救楚。丘逢甲以楚国破灭比喻中国将被瓜分。他将容闳比为申包胥，赞扬他为勤王之事，应梁启超的邀请准备西行赴美的耿耿忠心，也表达了对他容闳西行这一壮举的赞赏与钦佩。

除此之外，还有资料记载，容闳曾向新加坡警官询问，英国是否愿意支持维新派将在三个月内举行一次旨在救护光绪皇帝的勤王起义，得到的答复是：英国不支持维新派武装起义。至于容闳去没有去檀香山与梁启超相会。据谢纘泰在《中华民国革命史》里记载：容闳是于1900年4月4日在香港乘“中国皇后”号邮轮飞赴夏威夷檀香山。但容闳到檀香山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证实。当时梁启超倒是一切安排妥当，准备于4月20日赴美，肯定是与容闳同往，以实现自己到美国筹措巨款的愿望。但成行前3日，梁启超接到新加坡康有为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都是催促、要求梁启超即日回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梁启超估计，“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他只好决定取消美国之行，准备回国参加庚子勤王起义。这时候，因为国内形势突然有变，山东、华北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大有席卷京津之势，清政府对义和团是镇压或安抚意见不一，举棋不定。康有为与孙中山都看到了清政府面临的重重危机，决定乘此机会，加快发动武装起义，所以他俩都希望梁启超回国参与起义。

容闳的檀香山之行没有史料证实，但容闳面对新的形势变化，积极组织上海国会，吸收国内外维新与保皇等各派反清力量，等待社会局势稳定后，组建政府作准备。因为容闳此时既没有参加孙中山的革命党同盟会，也没有参加康有为的保皇会，这个国会组织在上海成立，还要取得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默许，所以由容闳出面组织，能为各方接受。容闳带着这个使命来到上海，与从日本回

国的唐才常、林圭和聚居上海的汪康年、章太炎、严复等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7月成立中国国会，参加国会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有资料统计共有80多人。众人推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长。容闳之所以在众多社会名流中被选为会长，可以说，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愿意看到的结果。

中国国会成立不久，梁启超、孙中山均从日本秘密来到上海，准备接应即将爆发的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庚子勤王起义，不幸8月22日，张之洞接到密报，将自立军首脑机关破获，逮捕唐才常自立军首领20多人，在审讯自立军首领时，张之洞得悉容闳也是国会匪首之一，唐才常等自立军首领被杀害后，容闳化名泰西仓皇与孙中山同船逃亡日本。

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清廷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但保皇会力量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为了给海外广大捐款支持勤王起义的侨胞一个交代，仍然筹划在两广发动起义，此后保皇会澳门总局仍分别筹办广东与广西军务，不料李鸿章通过驻英公使罗丰禄将保皇会在省港澳“密谋拜会”，“阴谋扰乱”的情况，照会英国外交部，称“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英国遂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查办。这更增加了保皇会在广东起义的难度。

容闳与孙中山在日本分手后于9月上旬应梁启超之约，抵达香港，梁启超随后也来到香港，目的是配合康有为在广东举事的计划，

他们拜访香港总督卜力，“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劝保皇会“切勿起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遂暗中放弃取粤。容闳与梁启超到香港后，交涉中闻知香港总督并不支持康有为从香港起兵攻取广州的计划，知道康有为难以成事，所以也劝诫康有为不要仓促举事。反而孙中山组织的惠州三洲田武装暴动打响了，虽然三洲田武装起义很快被清政府扑灭，这说明孙中山的组织能力与武装反清决心，是康有为、梁启超无法比拟的。从这时起，容闳与梁启超分手，梁启超奔赴新加坡接受康有为的指示，游历澳大利亚巩固、壮大保皇会组织，筹集款项。而容闳则与革命党人谢纘泰、李纪堂以及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在广州组织“大明顺天国”起义，因泄密被清政府破获。容闳在香港、澳门等地辗转躲避清政府的搜捕，于1902年春赴美国定居。

三、在美国哈特福德市老友重逢

容闳到美国后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金融名城哈特福德市，开始撰写回忆录，但还不时与保皇党梁启超保持联系，据1902年10月16日徐勤《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容先生往英京之事，据云待卓如兄来，各事妥办乃举行，现来即行也。”徐勤是康有为指定的美洲保皇会总头目，虽然信中没有交代派容闳到英国首都干什么，但要等梁启超来后再行动，显然容闳与梁启超有工作联系。梁启超是1903年初春游历美国，目的主要是按康有为的指示建立美国保

皇会支部和筹集款项。

1903年4月，梁启超专程到哈特福德市拜望忘年交容闳。《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以优美的散文记述了他与容闳友好往来数次会见的情景：“……一到哈佛如入桃源，一种静穆之气，使人倏然意远。全市贯一浅川，两岸嘉木竞荫，芳草如簟，居此一日，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举皆维新会中人也。时容纯甫先生闳隐居此市，余至后一入旅馆，即往谒焉。先生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觉悟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翌日乡人请余演说，容先生亦至。”从《新大陆游记》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身在异乡对老朋友的向往，而容闳的言谈仍然是忧国忧民，对于三十而立的梁启超，容闳寄予无限期望，“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使梁启超怦然心动，而容闳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保皇党今后行动方针的议论，更使梁启超深为钦佩。容闳还出席了梁启超对华侨的演讲会，陪同他参观耶鲁大学，对在美国工作的十几个当年的留美幼童，容闳一一引见。梁启超看当年的留美幼童，现在均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不禁感慨万端，一一评价。

余 论

梁启超1903年6月份离开美国浪迹天涯，与容闳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见面。纵观容闳与梁启超十几年间的交往，两人

互相尊重，坦诚相待，容闳与梁启超的关系，比容闳与康有为的关系更融洽，政治见识更加接近。追溯容闳与梁启超的最初相识，据现有的资料证实，容闳与梁启超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 1896 年 3 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曾经邀请章太炎、马相伯、严复、容闳等作为撰稿人。当时容闳常住上海。梁启超数次与容闳会见后，曾经给康有为去信说道：“容纯甫在此数见，非常人才也，可以为胜广。”数次相见交谈，评价容闳是陈胜、吴广式的人物，绝无贬义，应理解为容闳是英雄豪杰，因为前文有“非常人才也”。此后容闳曾数次进京向张荫桓呈递《容观察闳请创办银行章程》和《容观察闳铁路条陈》。梁启超在《时务报》的第九册和第十册两期刊登了容闳的银行与铁路章程，并加有编者按：“容纯甫观察，前年由张香帅奏调来华，今年译署檄入都，令商办银行铁路，均拟定章程进呈，本馆托人在京录得，特登报端，以公同好。观察久于美洲，于西人办事之法，最得要领，香帅原奏，有才识博通，忠悃诚笃之语。所定银行章程，妥密精当，最无流弊；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逮廿年后，即可本利清还，尤为权自我操。又欧洲各国相忌，若托彼国，则此国必求一事以相抵，托此国亦然，彼此相争，实为中国之患，惟美国为自保之国，可无此弊，想阅者必以为然也。”这也是当初梁启超对容闳办银行、铁路的有力支持。